

2012·学术前沿论丛

科学发展：

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

上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师范大学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发展： 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

KEXUE FAZHAN

SHENHUA GAIGE YU GAISHAN MINSHENG

上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 /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3-15789-1

I. ①科… II. ①北… ②北…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文集 IV. ①C6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460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 mm × 230 mm

印张：52.75

字数：9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10.00 元（全二册）

策划编辑：郭瑜 责任编辑：郭瑜 姚斯研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2012·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顾 问：满运来 刘川生 董 奇

主 任：史秋秋

副主任：曹卫东 陈之昌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妮	史秋秋	田晓刚	刘复兴	刘丽丽
刘 娜	陈之昌	张 涛	吴慧涵	陈 紈
范立双	周晓旭	胡学习	曹卫东	程文进

前言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既是不断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也是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2·学术前沿论坛”以“科学发展：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积极探索转型期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以解决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切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论坛筹备期间，编委会收到各学会专场提供的学术论文80余篇，学术价值较高，特此结集出版。另，为保持《学术前沿论丛》的延续性和系统性，“2011·学术前沿论坛综述”一并收入此书，以飨读者。

《2012·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2012年11月

目 录

北京市哲学会

- 建设文化强国要注重精神的层面 叶 朗(1)
- 中西哲学的差异与原因 张祥龙(7)
- 儒家政治哲学对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意义 周桂钿(20)
- 文化建设的价值之魂 马俊峰(26)
- 关于生态文明的哲学思考 卢 风(30)
- 以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推动文化创新 程倩春(44)

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 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闫志民(51)
- 建设坚强有力的高效政府是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证 李贺林(59)
-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四个“结合” 韩玉芳(67)

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

- 为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徐鸿武(75)
- 中国共产党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 李 涛 张德友(79)
-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聂月岩 黄存金(92)
- 中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与改善对策 王洛忠 常慧慧(101)
- 北京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现状、成效与未来 熊 炎(109)

北京市法学会

- 科学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的法治改革观 蒋立山(118)
- 文化冲突及其对我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刘双舟(128)



- 法院文化：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实践样本 吕 芳(134)
- “社会建设”的法理基础与制度保障 尹 超(143)

北京市历史学会

- 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牛润珍(152)
- 复兴之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张昭军(161)
- 纳粹历史与德意志民族认同危机 孙立新(170)

北京市人口学会

- 关于创新首都人户分离人口服务管理体制的理论思考
..... 陆杰华 黄匡时(180)
- 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研究：人口流动受益者的责任重构
..... 段成荣 邹湘江(187)
- 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人口变动及特点 童玉芬 武 玉(202)
- 发达国家的首都人口：问题、经验及其对北京的启示
..... 尹德挺 张子谏(217)

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

- 警惕儿童的心灵玷污 儿童青少年如何看待腐败现象 寇 彧(228)

北京市老年学学会

- 北京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挑战与对策 杜 鹏(246)
- 以需求管理为基础 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林 宝(253)
- 海淀区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李 杰 武 强(258)

北京市文艺学会

- 21 世纪研究民国时期北京文化人的意义 张 泉(270)

北京市语言学会

- 创新语言服务举措 给力海西社会发展 郭龙生(280)
- 从“位”与“非位”谈跨学科研究方法 黄 行(300)

北京市逻辑学会

- 在逻辑中探寻理性主体的类型 刘奋荣(310)



逻辑思维能力测试形式分析	杜国平(322)
基于描述逻辑的概念表示	李敏静 郭佳宏(332)
自然逻辑视角下的三段论与现代逻辑	张立英 刘新文(341)
从否定到矛盾	胡义昭(350)

当代北京史研究会

迈向市场国际化的旅游新平台	黄贵宝(358)
挖掘延庆传统文化资源 提升延庆文化软实力	范学新(367)
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 打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	孙晨露(376)

北京史研究会

北京精神与文化	李建平(382)
创新是北京历史的精髓	谭烈飞(396)
包容:北京精神的文化胸襟	马建农(411)
“厚德”与北京精神	郝志群(420)
凝练园林文化 传承城市精神	高大伟(431)
新形势下博物馆开放管理模式的探索	李彩萍(438)

建设文化强国要注重精神的层面

叶 朗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决定》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 and 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对我们大、中、小学的教育,对我们的人才培养,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对建设“文化强国”的几点认识。总的想法是,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要注重精神的层面。有不妥当的地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一、建设文化强国,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时提出,要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把更高的精神追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一个标志,这有极为深刻、极为深远的意义。这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改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上去了,物质生活富裕了,



如果没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那么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最终会受到限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天长日久，就会出现“人心的危机”，那是十分危险的。

国民性的问题是鲁迅提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不常提国民性的问题了，实际上这个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当今我们社会生活中一再出现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汽车轧死人扬长而去的现象，在建大楼、大桥倒塌的现象，这里都有国民性的问题。建设文化强国，要求整个社会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就是要改造和提升我们的国民性，也就是要重铸我们的民族精神。

二、建设文化强国，要注重艺术与高科技的融合

我们很多人都意识到，我们已进入一个创意的时代。但是怎么才能真正实现“创意”？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或者多数人并不清楚。比如，全国各地设置了许多文化创意园区，但是他们注重引进投资，盖了一个又一个五星级宾馆，但是不注重引进文化，在这些园区中真正能实现“创意”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并不多。又比如，我们的动漫产业在科技方面进展很快，但是缺乏艺术想象，缺乏创意，这成了一个制约我们动漫产业发展的瓶颈。又比如，我们国家的大学从数量上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大学如何培养富有原创性的人才，如何培养真正善于创意的人才，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令我们焦虑的课题。

在这个问题上，2011年去世的“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史蒂夫·乔布斯的去世，引起全世界的哀悼。人们称他为“富有远见和创造力的天才”，称他的“才华、激情和精力是无尽创新的来源”，称他“改变了世界”。

在乔布斯去世前半个月（9月19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发表文章《乔布斯可以教给我们的十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最永久的发明创造都是艺术与科学的嫁接。”乔布斯指出，苹果和其他所有计算机公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苹果一直设法嫁接艺术与科技。乔布斯的研究团队拥有人类学、艺术、历史和诗歌等学科的教育背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构成了苹果的创意（包括它的优雅和简洁的形式）的灵魂，有人鄙薄“苹果”技术含量低，就是没有抓住“苹果”创意的灵魂。正如《乔布斯传》所说，“苹果品牌的核心价值”就是“诗意与工程紧密相连，艺术、创意和科技完美结合，设计风格既醒目又简洁”。^①

^① [美]沃尔特·艾萨克森：《史蒂夫·乔布斯传》，28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这就是乔布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艺术和科学的融合，艺术和高科技的嫁接，乃是创意的灵魂。再扩大一点说，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乃是我们这个创意时代的灵魂。

这个思想，其实钱学森先生晚年就一再对我们提示过。钱学森先生去世后，大家都写文章纪念他，还有一些地方举办研讨会，这些文章和研讨会都讨论一个问题，即“钱学森之问”，就是钱先生提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出一流人才的问题。实际上钱先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至少从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有记者采访他。钱先生说，他现在岁数大了，小问题他不考虑了，也就考虑大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呢？就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怎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那么怎么培养杰出人才，怎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钱先生提出一条，根据历史经验，也根据他本人的经验，我们的大学教育要实行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这是钱先生晚年一再强调的一个思想。其实不光钱老，季羨林先生晚年也一再强调人文和科学的结合。钱学森先生、季羨林先生提出的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结合，不仅是对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历史经验的概括，而且是对我们这个创意时代的时代要求的天才的预见与乔布斯的经验完全一致。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艺术与高科技的嫁接，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创意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不仅应该成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指导原则，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一切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指导原则。我们要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三、建设文化强国，要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

文化产品从生产来说，不仅有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内容问题。例如，我们的电影、电视有了高清晰技术、3D技术，但如果没有内容那还是空的。现阶段我国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与内容出口都非常薄弱，面向当代、面向国际的原创力不足，还不能与日本、美国等文化产业强国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当确立一个内容战略，将文化产业的内容建设提到战略高度。

文化产品从社会功能来说，不仅有一个娱乐消遣的功能，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的人性的功能。我们的文化产品应该体现一种文化精神，应该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引导广大青少年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不能脱离文化精神。文化精神，又称文化理念或文化理想，它应该贯穿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中。即使是商业片也不能只追求票房，不能不讲求人文内涵，因为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不同，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不能不考虑文化精神。我们过去强调文化产品的政治导向，政治导向很重要，但还有一个人文导向（包括价值导向、趣味、格调等）。人文导向和政治导向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有的作品政治导向没多大问题，但人文导向有问题。因此，除了政治导向以外，我们还应该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

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实施内容战略，也许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传承和创新）；当代艺术的经典化（扎根和提升）；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融入当代趣味）。

四、建设文化强国，中国人要使自己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人逐渐富裕了，有少数人甚至一夜暴富，但是一夜可以暴富，文明素质却不能一夜提高。我们看到社会上少数人拼命炫耀自己有钱，他们抢购高档轿车，抢购私人游艇和私人飞机。媒体报道中也提到，中国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但是这样一种形象并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要通过学校教育、新闻媒体、文化艺术活动，营造一种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使人变得越来越有教养，越来越高雅，而不是使人越来越低俗。

五、建设文化强国，要使中国文化为国际社会了解、认同、向往

建设文化强国，要使国际社会了解我们的文化，进一步认同、向往我们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就是文化的软实力。当今世界，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最强的，文化实力也是最强的，它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它的电影、饮料、快餐遍布全世界，这就是文化软实力。比较起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还很陌生，不了解，不理解，甚至还有许多误解。

我们要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艺术，使国际社会了解，愚昧、变态、血腥、乱伦不是真正的中国，自古以来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祈求和平、盼望富足、优雅大度、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美善相乐，才是真正的中国。孔子说过：“近者悦，远者来。”我们相



信, 21 世纪, 中国文化一定会重新焕发这种“近者悦, 远者来”的魅力和吸引力。

六、建设文化强国, 要照亮中国当代的文化大家和文化经典

建设文化强国, 应该产生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家和文化经典、艺术经典。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 都有一些学者、艺术家长时期在埋头研究和创作, 他们脚踏祖国大地, 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在他们中间, 正在产生或已经产生当代的文化经典、艺术经典, 他们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当代的文化大家、艺术大家, 在他们中间还可能会产生继承中华文明传统和反映 21 世纪时代精神的新的学派。这是时代的呼唤。问题在于, 我们要善于发现, 要把他们照亮, 使他们得到足够的重视, 要使国内广大群众知道他们, 要把他们放到庄重的国家舞台上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涉及塑造中国当代的国家文化形象的问题。塑造我们的国家文化形象不能仅仅依靠功夫明星、广告明星。

七、建设文化强国, 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复兴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经济的复兴,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 在观念上, 我们要学习、继承中国的哲学智慧, 《周易》、孔子的智慧, 还要学习中国的文学经典、艺术经典。经典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和最高美感的结晶。我们要在全社会提倡尊重经典, 要引导青少年学习经典、熟悉经典。我们不反对快餐文化、流行艺术, 但是我们反对用快餐文化、流行艺术来排挤经典。我们也反对解构经典、糟蹋经典, 把经典荒谬化。经典的作用不可替代, 经典的地位不可动摇。

另一方面, 生活上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当代生活。这不是在表面上、形式上复古, 不是穿古装、行古礼, 而是要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 如前面提到的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祈求和平、盼望富足、优雅大度、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美善相乐的精神, 融入当代的生活, 使我们的老百姓过一种既享受高科技的成果, 又有高远境界和优雅品位的生活。



八、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将在文化上、在精神的层面上影响世界

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力量正在上升。据高盛预测，到 2027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到 2050 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而英国和德国将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正像有的国外学者所说，这些经济预测，惊心动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我赞同国外有的学者的看法，就是那种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观点，已经有些过时了。在历史上，中国人的智慧和美感对世界发生过极深刻的影响，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有重大的贡献。大家都知道“四大发明”，这个不说了。伊朗血统的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谷子、高粱、樟脑、桂皮、生姜、水稻、麝香和大黄的栽培史以及经过波斯传向西方的过程。他认为罗马人使用的杆秤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衡具是起源于中国，冶炼术也起源于中国，后来经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他还举了一个有趣的小例子，就是“郁金香”。大家都知道郁金香产在荷兰，他告诉我们实际上郁金香是一种中国花，15 世纪末移植到伊斯坦布尔，荷兰人在那里发现，并移植到自己国家。所以在 15 世纪，波斯流传着一句话，“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波斯国王哈桑就向威尼斯的使节约萨约·巴尔巴罗提到过这句谚语。因为当时波斯人认为希腊人仅仅懂得理论，是中国人发明了大部分专门艺术和技术。我相信，21 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深刻的、更深远的将是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科技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影响。

建设文化强国，我们要使整个社会具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要注重艺术与高科技的融合；要高度重视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要让中国文化被国际社会所了解、认同、向往，我们要照亮中国当代的文化大家和文化经典，我们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复兴。总之，建设文化强国，我们将会看到，在 21 世纪，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影响世界，更深刻地、更深远地，中国将在文化方面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影响世界。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西哲学的差异与原因

张祥龙

这个题目很大，不可能面面俱到，这里只是尽力把有关问题理出一个可供大家讨论和批评的轮廓。以下计划讲这么几个部分：第一是一个概论，说明自觉的中西比较的必要。第二是谈中西哲学关系、尤其是差异的原因，主要通过各自语言的不同结构来讲。这两部分都涉及哲学与文化的关系。第三部分讨论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也就是由于前面所谈的语言结构的差异而造成的思想分殊。第四是中国哲学的未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够在未来得到更重大的哲理思想成就。

—

中国人从 19 世纪以来搞的哲学活动，从根本上、本质上是中西比较的。我们历史上没有“哲学”这个词，也没有相应的学科。它是日本人在 19 世纪后期引进西方学术思想时，根据中文造的一个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于 20 世纪早期开始，由一些学者从西洋、东洋引入“哲学”（方法、术语、问题等）后，而逐渐造就的。我们现在哲学里面使用的大量概念、名词、话语，都还是日本人造的，也就是他们引入西方哲学时所造的。身为哲学系的人，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学科的真正脉络、学科特点。我们中国的广义哲学（今天我讲的“哲学”是在广义上讲的，不限于传统西方哲学），有一个相当久远的源头，但是就它的现代形式看，又有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开端。我们现在用的哲学这个词，带有某种意义上的殖民地色彩，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推进的过程中，把哲学的一套术语和这个学科传给了或强加给了我们。东西方交流，可能是好事情，我们在几个世纪后回头看，会知道这是躲不开的。但如果这中间方



法用得不对，会出现一些重大问题。在我看来，“东西方比较”到目前为止是不平等的；在哲学这个活动中，基本的规则是由传统西方的模式拟定的。而中国现代学人对哲学的态度，大都认为：只有通过传统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才算是哲学。在中国哲学方面被现代承认的书，第一本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之后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1931—1933)，学界认为从它们开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影响更大的冯先生的那本书中，针对哲学方法问题，他在开篇就讲：“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

冯先生治中国哲学史很深刻地影响了之后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1949年之后盛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是逻辑的、科学的角度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对逻辑的、科学的理解，黑格尔的、恩格斯的和苏联教科书的表达各有区别，但它还是最基本的方法。它对西方传统哲学极其尊重，将它的概念化思想方式奉为哲学的标志。从另外一个角度，西方的哲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哲学的呢？我觉得，传统西方哲学家中，有几位，比如莱布尼兹、伏尔泰、沃尔夫等，对于中国古代哲理非常尊重，甚至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交流较少，误解甚多。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评价很低。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有对孔子、老子、庄子、《易经》的一些蔑视性的言论，还包括对中国文字的批评，并隐含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地位的歧视，这些大家都可以在此书和他的其他一些著作中看到。他看不起中国文字，认为是一个一个并列的原始符号，缺少语法。并认为孔子就是一个世俗智者，没有什么思辨理性。老庄、《易经》虽然含有某种对于世界本原的体悟，但都用过于直接和感性的方式来表达，因而未得要领。他对中国哲学的批判集中在一点：缺少概念的规定性。我们很多学者，出于民族感情，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概念范畴的发展史。但是这样做的方法，是不是等于是你已经承认并接受了黑格尔的标准和框架，然后在其中与它争一日之长短？这样做能不能提高我们的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这个我是很有疑问的。黑格尔讲中国古代思想缺少概念的规定性，就他所定义的“概念的规定性”而言，这说法并无大错；问题是缺少这种规定性是否意味着缺少哲理的深刻性。在这里，他的判断才出了大问题。中国古代哲理的出色之处，可能恰恰是他无法领会的。如果以这规定性为衡量哲学的标准，那么中国古代哲理，无论你怎么费力去找出其中的范畴发展史，相比于西方传统哲学，也永远是个矮子。但如果通过其他的视野来看，中国古代哲理可能是极其深邃的、原本的和揭示真理的。



到了 21 世纪,情况稍有松动,前些年出现了某些反思努力,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要点还是哲学方法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理解哲学,什么样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在黑格尔和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哲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不配算是正式的哲学,虽然也用了哲学这个词,但只是萌芽阶段。要古希腊的那种哲学才行,印度的都不够。

我们中国人,虽然很愿意把自己的哲学说得好一些,但是我们看以前的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和资料集,里面对于中国古代哲理的评价,正面的不是说这里有辩证法的萌芽,就是说那里有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萌芽状的”等,是对中国哲学的最高褒奖。这就是依“概念的规定性”的游戏规则而产生的学术效应,不依个人的感情为转移。

这实际上反映出,按照黑格尔的方法和哲学视野,我们中国哲学永远不够格。我感到,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不适当的哲学观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哲学史和哲学本身的研究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比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还要严重和普遍,连无数的民间哲学家都被它套住了,难有作为。简单讲起来就是过于注重概念化的静态方法,使得它控制下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像孔孟老庄,都脱离了当年它们生成的情境和依靠的技艺,比如说道家有修炼术,有手艺(像庖丁的解牛,梓庆的造鐻,楚丈人的园艺等),儒家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或诗、书、易、礼、乐、春秋,如果不懂这些,怎么能深刻地理解这些哲理呢?但我们现在就是从概念上搞,甚至还追寻概念和范畴的逻辑发展史。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思想去中国化、去生命化,成为僵死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与当代西方也不沾,跟国际也不接轨。因为我们依据的是传统西方哲学,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过时的东西。例如探讨老子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谈中国哲学的范畴化,这个在国际上是不会有有什么大的反响的。就好像是在相对论量子力学都出来的时候,还在套用初级的牛顿力学,甚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尤其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那么动态、非对象化的东西,特别地不合适。当然我们不必太看重这第二方面,关键是要让中国古代哲理本身的活力得以表现,不要先将它们制成概念化的标本,然后再研究。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审查中西方哲学的关系,不加反省就认同传统西方哲学方法的普世性,忽视了东西方哲学的异质性,于是不适当地套用了对我们古代哲学最不利的方法。我们传统的古代哲学,在全世界各个民族诸多哲学的谱系中,是最富于动态化、情境化、非对象化的。而我们在传统西方